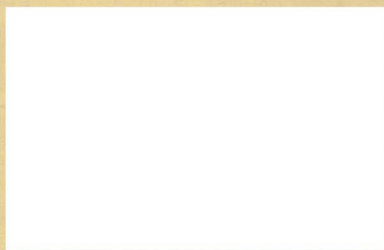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商业史



北京商学院

一九八三年五月

中国近代商业史

王相钦 编著

前 言

中国近代商业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近代商业也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经历了极其艰苦曲折的发展过程。根据历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商业史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共一百一十年。按照时间顺序和内容的特点，我们将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重点阐述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影响下，中国商业结构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变化。第二编重点阐述在外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入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市场、商业组织以及企业内经营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第三编分为两个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里，重点阐述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崩溃；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里，重点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史，进入了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商业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商业的历史时期。

要深入开展商业经济理论研究和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学习和研究商业发展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今天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昨天、前天商业的一个发展，只有对昨天和前天的商业发展变化作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我国商业发展的历史遗产，才能做到“古为今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新局面，更好地发挥商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我院周明星教授就编写了《中国商业史讲义》，同时也指导了这次中国近代商业史的编写工作。完稿后，曾经领导审阅。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也吸收了社会上的科研成果。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掌握的历史有限，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因目前教学急需，先行付印使用，不当之处，将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作进一步修改。

编 者

一 九 八 三 年 三 月

中国近代商业史

目 录

第一编 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转化时期的商业

(一八四〇——一八九四年)

第一章 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和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国内市场概况·····	(1)
第二节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独立主权的丧失·····	(6)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	(10)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商业措施和中国商业结构的变化·····	(15)
第一节 清政府的商业措施·····	(15)
第二节 中国商业结构的变化·····	(20)
第三章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下中国国内市场的变化·····	(27)
第一节 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27)
第二节 商业中心的转移和内地商业城市的发展变化·····	(30)
第三节 商业行业的发展变化·····	(32)
第四节 商业资本活动作用的扩大·····	(35)
第四章 太平天国商业·····	(39)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及其商业思想·····	(39)
第二节 鼓励和保护商业政策·····	(42)
第三节 太平天国商业的发展·····	(44)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	(47)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时期的商业

(一八九五——一九二六年)

第五章 甲午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1)
第一节 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	(51)
第二节 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控制·····	(53)
第三节 在外国资本输入的影响下,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5)
第六章 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的商业政策和国内市场·····	(62)
第一节 商业思想和商业政策的变化·····	(62)

第二节	国内市场的发展	（63）
第三节	国内市场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69）
第四节	国内市场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72）
第七章	商业行业和组织形式的发展	（76）
第一节	商业行业的发展变化	（76）
第二节	新式商店和特种商业的兴起	（78）
第三节	商业组织形式的发展	（81）
第八章	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86）
第一节	商业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	（86）
第二节	商业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	（88）
第三节	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技术	（90）

第 三 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商业

（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年）

第九章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国内市场的缩小	（95）
第一节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和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的形成	（95）
第二节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台湾、东北市场的殖民地化	（98）
第三节	四大家族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内市场	（101）
第十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商业统制和国内市场的崩溃	（108）
第一节	国民党政府的横行暴敛和对国内市场的统制	（108）
第二节	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独占	（111）
第三节	四大家族掠夺的加剧和国内市场的崩溃	（113）
第十一章	解放区的商业	（119）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商业的产生	（119）
第二节	解放区商业的经济成分	（121）
第三节	解放区的商业政策	（123）
第四节	解放区商业的发展	（125）
附录一、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130）
附录二、	商埠	（153）
附录三、	近代年号纪元对照表	（160）
附录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162）

第 一 编

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时期的商业

(一八四〇——一八九四年)

第 一 章

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和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国内市场概况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独立国家。

清朝前期，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使中国的封建经济又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但是，到了乾隆中期以后，由于清王朝的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也已发展到了它的衰微时期。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内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下，发展极为有限。

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国内市场的发展

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封建社会的特点时指出：在封建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①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具体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耕与织的结合。这种耕织结合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例如，直隶各县，“男力稼穡，女勤纺织”，“耕稼纺织，比屋皆然”。（黄彭年：《畿辅通志》，卷二四）江苏常、昭二县，“乡村妇女，农时具在田首，冬日则相从夜织。”（庞鸿文等：《常昭合志稿》，卷六）浙江安吉县，“麻布，妇女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8页。

以家种麻纺织之，雇匠织成，止以自用，鲜有卖者。”（张行孚等：《安吉县志》，卷八）^①又如英国驻广州代办米契尔报告书中的福建农民，“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个农民，他是庄家汉又兼工业生产者。”^②这个材料反映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未遭破坏时的情况，可见鸦片战争以前更是如此。这种耕织结合，是衣食两种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结合。人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给，只是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才拿去交换，其数量有限，国内市场也不可能有很大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据周建鼎等《康熙松江府志》记载，松江地区，“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纺织不至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③浙江仆院镇的居民，“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杼机之利，日生万金。”^④“日以万计”和“日生万金”，说明这些手工业产品的商品性已很高了。而一些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如矿冶、制瓷、制盐、造纸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本来就有一部分是属于商品生产的。除了手工业产品商品化以外，商品性较大的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扩大了。同时，工商业发达和经济作物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也有发展。

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交通和商业城市的发达。当时，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是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灵渠则是岭南与长江流域联系的纽带。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浒墅关在康熙年间，已是“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时，汉口的一次火灾，被烧商船三、四千只。^⑤集中上海的沙船有三千五六百号，“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则运至山东、直隶和关东。^⑥吴江盛泽，“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⑦当时的北京、苏州、江宁、杭州、扬州、广州、汉口、佛山都是商业发达的城市。有的还以产销某种产品而闻名，如松江、上海的纱布，苏州、江宁、杭州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芜湖的米，扬州的盐，佛山镇的铁器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集、墟、场、市行等定期贸易市场的发展也更加普遍。

当时，我国市场上占第一、第二位的商品是粮食和棉布。据吴承明的考察研究分析，粮食的商品量约为二二〇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市场价值约一点四亿银两，进入长距离贩

①、以上资料均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1、102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0页。

③、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229页。

④、胡涿：《仆院镇记闻》，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上册，第22页。

⑤、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四。

⑥、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见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第86页。

⑦、陈夔缙等：《乾隆吴江志》，卷五。见彭泽益：前引书，第一卷，第209页。

运贸易的大约只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棉布的商品量约有三亿匹，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市场价值约一点五亿银两，进入长途贩运的大约占总商品量的百分之十。在全国主要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一，棉布占百分之二十七点零四。另一种大宗商品是食盐，约五千多万银两。其余茶、丝绸、糖等长距离贩运较多，但在整个市场上所占比重不大。^①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一般认为，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清代中叶以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市场扩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那些生产条件较好的赚了钱，逐渐富裕起来，而生产条件差的赔了钱，日益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富裕户逐步购置生产资料，以至雇工劳动，逐步变成了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生的资本家。除了小生产者分化以外，还有一部分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成为包卖主。这种包卖主利用小商品生产者的困难，向他们贷放资金和原料，低价预购他们的产品，或者要他们按规定的标准生产，付给他们报酬。这样，包卖主也就成为雇工剥削的资本家了。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是十分明显的。如以江南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为例，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江宁“在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又据续纂《江宁府志》补遗，“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康熙以后限制免除，“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②这些机户，如果以每机一人计算，一个机户雇用的工人也有几百人之多。“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③这种情形，正如马克思指出：“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同地（或者说在同一工场），在同一个资本家指挥下为生产同种商品而进行劳动，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④当时，还出现了“帐房”和“行号”，在苏州，“各帐房除自行设计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吴县志》，物产二）镇江“开设行号者十余家，向由号家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⑤这些“帐房”和“行号”为小机户提供原料，收取产品，给予工资，就成为组织资本主义家庭生产的包卖主了。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

①、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10—311页；《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

②、转引自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历史问题论丛》，第218页。

③、见彭泽益：前引书，第一卷，第214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40页。

⑤、转引自《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75页。

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还十分巩固，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某些发展，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下，发展的深度与广度都极为有限，从整个社会来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然而，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社会因素，却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②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二、封建社会制度对国内市场发展的阻碍

封建社会制度对国内市场经济的阻碍，除了前面讲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沉重的封建剥削使广大农民极端穷困和落后，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民。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③在清王朝统治下，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的直隶怀柔县郝氏，有“膏腴万顷”。嘉庆年间被抄家的大官僚和珅，有“地亩八千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投降派琦善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亩”。④对于当时土地兼并的事实，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康熙四十三年上谕中说：“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⑤到乾隆时期，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具为佃耕之户”。⑥这就是说，当时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少数人所占有，一些原先有田的农民也变成了佃农。

无地的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就要承受地主的地租剥削，清代的地租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剥削以外，还必须向封建政府缴纳赋税和从事无偿的劳役，同时，还要受封建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之下，一部分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边疆垦荒或变成流民，过着到处流徙的生活。大部农民则继续留在农村，承受更加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据凌介禧《程安德三县田赋考》记载，康熙后期浙江程、安、德三县，“耕夫终岁勤劬，计十亩之所入，得半不过十石，八口之家，何以养生送死，供饘粥而殖其生！”⑦这还是自耕农的情况，佃农更苦，乾隆初年，河南农民“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交田主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620页，第618页。

④、⑦、见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第69页，第99页。

⑤、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七十三。

⑥、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息外，余存无几”，再加上欠租负债，“则是虽获丰收，仅足偿欠，穷佃其何以堪”，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猪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佚名：《心正录》，卷二）^①广大农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从事生产，不但无力改进生产技术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而封建统治阶级获取的大量财富，主要是用于奢侈豪华的生活享受，并不是用于生产发展事业。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正如毛东泽同志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②

封建统治者用赋税、地租等方式掠取了农民的大部分产品，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极端穷困和落后，从根本上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发展。

其次是封建政府对一些重要的有利行业实行封建的垄断控制，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发展。例如，实行盐铁专卖，以控制日常必需品的运销；建立江宁、苏州、杭州的官营织造局，专门满足封建朝廷对绸缎的需要；建立景德镇“御窑”，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等等。使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优质的手工业产品脱离了市场的正常流通，缩小了国内市场的范围。

第三是在“抑末”思想的指导下，对民间工商业进行超经济掠夺，阻碍了工商业的 normal 发展。例如：云南铜矿中的“收买官铜”；景德镇瓷窑中的“官搭民烧”；城市工商业中的“铺户当官”，等等。由于封建政府的残酷掠夺，使广大工商业户处于无利可图的境地，从而，也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第四是设关征税，阻碍商品流通。清政府在全国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税关，计有户关二十六处，工关近十处。除户关、工关以外还有税卡，全国的关税数额虽不大，但征税手续繁杂，税吏任意作弊，额外需索十分严重。而且商品流通还必须按指定路线进行，严重阻碍了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正常流通。

另外，封建政府还实行闭关政策，阻碍国外市场的发展。清初，为了镇压以郑成功为首的汉人民的反清斗争，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下令“片板不准下海”。一六八三年清王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口岸。一七五七年以后，又限定了广州一口通商，同时，制定了许多限制对外贸易的措施，阻碍了中国国外市场的发展。

清政府闭关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严格控制中国商人的对外贸易。首先是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商人出海贸易建造船只需预先得到州县官府批准，“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并不准商船出租或租入。如有违反，不但商人有罪，而且连地方官也要受到罚俸和降职处分。^③其次是限制出口货物。粮食、五金、军火以及书籍均严禁出口，对丝、茶、大黄等主要出口商品的输出量和输出方式也严加限制。例如，对头蚕湖丝缎匹等一直严禁输出，对其他土丝二蚕丝也只有皇帝特恩批准或换铜需要的情况下才能限额输出。对于茶叶“则永禁出洋贩运。倘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拿获，将该商人治罪，

①、见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第8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619页。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120页。

并将茶叶入官。”^①另一方面，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地。并由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公行（十三行）包办一切，并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种种限制，提出了许多防范外国商人活动的章程，这些章程有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但是有的是完全不必要的。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国妇女进城等等。这也是清王朝闭关政策思想的反映。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是封建落后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意识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一种消极抵抗。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闭关政策不但没有起到阻止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国外市场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知识，加深了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程度。因此，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事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②历史的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

第二节 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独立主权的丧失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对封建落后的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是以英国强行对中国推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称之为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的起因

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已经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国防空虚，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社会经济危机十分严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爆发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些农民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但是，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日益削弱，整个社会已处于“日之将夕”，“大乱将起”的衰世。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叶又完成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英国之外，法国等西欧国家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寻找殖民地市场，必然要加强对海外掠夺。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③列宁也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④早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就加强了对东方的掠夺和扩张。一六〇〇年，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6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③、《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0页。

④、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545页。

英国势力侵入印度。十九世纪初英国完全控制印度以后，就进而向中国扩张，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它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市场。

但是，英国的对华贸易并不顺利，它的工业产品遇到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出超的。英国的主要产品棉毛织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那时候，中国土布输往英国的总值一直大于英国棉布输入中国的总值。东印度公司运来的毛织品和金属制品，每年不过数千两，而且连年亏本。相反，从中国运出的茶叶、生丝等却有很大的利润。因此，英国不得不用现金来支付逆差。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装载白银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商货则不足百分之十。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用印度棉花来抵消一部分差额，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对华正当贸易的逆差每年仍在二、三百万两以上。^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资产阶级用尽了各种办法，通过外交途径、军事恫吓，运送各种商品等等，都未能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找到了鸦片这个武器。

鸦片输入中国的历史很早，但是，在十八世纪以前，一直是作为药材输入的。“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过二百箱，每箱一百三十三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三美元左右。”^②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商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一七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的种植制造特权以后，输华鸦片数量激增，具体情况如下：^③

1801——02年	3947箱
1821——22年	5959箱
1831——32年	16550箱
1835——36年	30202箱
1838——39年	40200箱

上述鸦片数字中，一部分属于美国、葡萄牙输入的鸦片。后两数字中，未扣除运往东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约四、五千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改变了中英贸易关系。在英国对华商品输出中，鸦片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也由出超变为入超。如一八三〇年，英国在不到二千五百万元的对华贸易额中，鸦片就占了一千三百万元，这一年中国输出白银达六百七十万元。鸦片贸易给鸦片经营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如一八三一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获利为成本的六倍。一八一七年鸦片来华每箱差额合银元四百余元。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英印孟加拉政府鸦片抽税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十分之一。^④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增加了血腥的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页。

②、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页。

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38—239页。

④、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8、19页。

首先是毒害和摧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和体质，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当时，中国“食鸦片者遍天下”，到处都是烟馆。“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①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吸食成瘾，使人身体衰弱，精力耗散，神志萎靡，丧失劳动能力。

其次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人们把财富都消耗在鸦片之中，甚至“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如一八二〇年时有人估计，“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②苏州这样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居民有十数万人吸食鸦片，其他城市也可想象，这就必然造成社会日益贫困，购买力下降，影响农工商业的发展。

再次是引起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财政枯竭。据一般学者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一千万两左右。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

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不仅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使社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使清王朝官吏愈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丧失，严重损害了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禁烟派首领林则徐奏称：“（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③林则徐的禁烟主张，虽然遭到了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的反对，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暂时赞同。因此，一八三八年十一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迫使英商等缴出鸦片二万多箱，共二百七十三万斤，值时价二千四百万元。于当年六月，在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个坚决行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决心。

英国资产阶级早就企图使用武力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在鸦片贸易上，英国政府完全与鸦片商人同流合污，面对中国严厉的禁烟运动，极力寻找战争借口。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以中国停止中英贸易为由，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六月，英国侵略军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④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但是，由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蕴藏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巨大的反侵略力量无法充分发挥，尽管在反侵略斗争中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仍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结局。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中国独立主权的丧失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中英江宁

①、黄爵滋：《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35页。

②、包进臣：《安吴四种》，《鸦片战争》，1，第427页。

③、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吸烟以杜弊端片》，《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41页。

④、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8页。

条约》，即《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五口通商。准允“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我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

（二）准将香港一岛给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据点和商业基地。

（三）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鸦片赔款六百万元，行商累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这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

（四）秉公议定关税。“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价不过分”。这是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的开始，它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取消公行制度。英商在粤贸易，向例通过由清政府控制的行商承办，“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个规定，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势力。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接二连三地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作为《南京条约》附约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与美国与法国分别签订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附约，则是《南京条约》的进一步扩大。

在此期间，沙皇俄国通过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条约》、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以及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我国现有领土的七分之一以上。

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割地、赔款等直接掠夺之外，还使外国侵略者获得了许多特权。如开放商埠，设立租界，沿海、内河自由航行通商权，“秉公议定”中国关税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对中国商业发展危害极大。例如，“秉公议定”关税，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税“秉公议定”，这个“秉公议定”，从文字原意上应该是由清政府“秉公议定”，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来却成了中国海关增减进出口货税率，要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中国自己无权决定。一八四三年签订的第一次《海关税则》，规定征收关税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出口包括六十一种货物，进口包括四十八种货物。绝大部分进出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当时的英国的谈判代表罗伯聃也承认，“议定的税率，对（英国）进口商来说，竟比商人们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利一些。”^①在出口货中，大黄、土丝等的税率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夏布大约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五；南京棉布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在进口货中，鸦片战争前，英国棉织品输入最高负担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现在最高是百分之七，新税率比旧税率

①、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第118页。

减少百分之七十九。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值百抽五”的原则，进口各类商品税率又比一八四三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六十五。^①关于内地税，即子口税，《南京条约》规定，“按例纳税”，“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不得加重税利”。《天津条约》规定，洋货进入内地或洋商收购土货出口，“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一八七二年，英国侵略者又逼迫清政府承认，中国商人贩卖洋货也得受子口税保护。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而且造成了进口税低于出口税，外国货税低于中国货税的不正常状况。中国的关税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而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洋货和掠夺中国农产原料提供了有利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的政治独立丧失了，闭关政策被打破了，关税屏障也不存在了，整个中国也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②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变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愈陷愈深。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输入大量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要扩大工业品的市场，不能仅仅满足于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对洋货进行了五十年左右的抗争，终于失败，到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根本动摇了。

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手工业的没落和改组

衣食是生命之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这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是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手工棉纺织业。因此，自然经济解体过程的发展，也首先是表现在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没落上。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增加最多的是棉纺织品。从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从524198镑上升到5313036镑，增加了十倍以上，其中纱布经常占百分之六七左右。美国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三年，输华棉布也从一百二十多万美元上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美元。特别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外国棉纱棉布的输入进一步增长。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〇年，进口棉纱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一，进口量却从五万担增加到一百零八万担。同时，棉布的价格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四，进口量也从一千二百多万匹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万匹。^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

①、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620页。

③、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62、68、72页。

中国自给自足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挤垮手纺业。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排挤手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机纱代替土纱的过程就在各通商口岸及其邻近腹地猛烈展开,很多手纺业者被迫放弃了纺车,转入以洋纱织布的手织业,利用输入的洋纱来抵抗输入的洋布。与洋纱代替土纱相比,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却是缓慢得多。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后,土布也逐渐为价格低廉的洋布所代替了。据海关统计资料记载,当时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洋布代替土布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九四年,上海向国内出口的土布从四万零九十一担下降为一万六千三百四十三担;福州进口土布则从二万八千二百二十三担,下降为一千九百二十一担。^①以致薛福成在《庸盦海外编》中指出:各地“洋布洋纱”,“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②当然,从全国范围看,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进程各不相同。大体上,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附近,发展过程较快,在交通不便的内地、山区发展过程较慢,甚至没有什么影响。直到甲午战争前的一八九四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洋布还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一。^③但是,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与手工棉纺织业没落的同时,其他与洋货输入竞争的手工业也大多走向衰落。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洋铁、洋针、洋火、洋油的进口不断增长,造成“民间日用,无一不用洋货”的现象,使土铁、制针、火石、榨油等业都受到严重打击,有的也就逐渐被淘汰了。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东南数省的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在外国资本主义机械产品的竞争下,没有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或者经过改组的手工业也逐步向商品生产发展了。例如,在土纺土织业衰落的同时,洋纱织布业又得到了新的发展。一些适应外销需要的手工业发展更为显著。而这种手工业已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生产了。

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没落和改组,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农民从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而城市的手工业者则成了剩余的劳动者和商品生产者。从而也为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商品化也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产品商品化发展极为缓慢。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农产品商品生产主要还只限于若干手工业原料,地域上也只限于若干经济中心。农产品商品化的普遍发展,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开始的。

①、转引自《清史研究集》,第二辑,第157、158页。

②、见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第502页。

③、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12页。

④、见彭泽益:前引书,第二卷,第165页。

农产品商品化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上。中国经济作物的商品性本来就较高,明清时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地区交流。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原料的掠夺,促进了经济作物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作物生产和交换发展的情况,没有统计资料,现从它的出口数字来看:①

	丝	茶	豆类	棉花	油类	烟叶
1868年	57346	1440871	578209	38141	261	737
1894年	99442	1862310	1585870	747231	196728	113986

单位:担,1868年的豆类是1870年的数字。

出口数字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作物商品化发展的情况。

蚕桑:丝的出口虽有起伏,但蚕桑业仍有很大发展。不仅老产区“皆种桑林,养蚕取丝,其利百倍”,而且一些原先不产蚕桑的地区也得到了发展。如江苏高邮,“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夏子阳等:《高邮州志》,卷二)广西容县,“光绪元二年,务蚕者逐渐增加,至十一、十二年更踊跃劝功,蒸蒸日上。每年邑中共得蚕丝银约百万余两。”(何见扬:《省心堂杂著》,卷上)此外,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纷纷种桑养蚕获利。②

茶叶:茶的出口增加最少,主要是受到印度、日本茶叶的竞争。如福建武夷山区,“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沾其利,遂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近年以来,外洋印度等处产茶日多,行销日滞,富商大贾,历次亏折,裹足不前。”“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卞宝第:《卞制军政书》,卷四)由此可见,外国资本对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影响之大。

棉花:棉花过去一直是入超的,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入超逐年下降,八十年代后期转为出超,促进了中国棉花种植的不断扩大。如据一八六九年海关报告,美国内战,世界棉花供应紧张,造成了中国棉花市价飞涨,“使种植者受到极大的震撼,而放弃了其他作物的种植。”一八八〇年《申报》报导,“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

花生: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本产闽粤,种植发展很快。如直隶深州,“光绪十许年后,花生之利始兴。其物远行闽粤,外国购之,用机器榨油,转售中国取利。以此种者沾其赢余,相习益多。亦颇自榨为油,以便民用,其岁入过之种谷。”(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卷九),又如江苏淮安府的花生种植“盈畴被野,与麦豆等。”(昆田:《淮安府志》,卷二)

烟草:明朝才开始传入中国,到清代已普遍种植。如安徽凤阳县,“近城一带,所产烟叶,较他处为佳。七八月间,商贩四集,贫民颇资以作食用之缺。”(王汝琛等:《凤阳县志》,卷四)苏州“所用烟叶,大半运自浙省。”(《申报》,光绪六年)一八九五年,甘

①、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统计表。

②、以上农产品商品化引用资料,均见李文治:前引书,第一辑,(下同)。